

# 金融的价值取向与国家安全

□张云东

金融开放目前似乎已达共识,但人们对金融开放这一命题背后的金融本原认识、机遇判断,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金融是把“双刃剑”,如何正确把握金融的发展方向,兴利除弊,则需要我们跳出当今国际金融潮流趋势,逆向思维,深刻反思,切合中国当今战略需求,让金融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而不是干扰复兴。金融开放放简而言之,对内主要是金融交易方式,金融工具和参与主体的制度确定;对外主要是资本流动和经营权让渡的制度安排。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金融的本原、服务对象入手阐明金融的正确价值观和以衍生品泛滥为特征金融异化的危害。二是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转型要素和外部环境入手分析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选择、策略安排,以及对境外机构金融经营权开放的策略安排。最后,从国内金融市场的衍生品化和对外开放资本账户的政策交互来看国家安全将遭受的巨大冲击。

## 金融的本原与衍生品的危害

2008年本原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我国经济也间接受到冲击,并以独特的方式受负面影响至今。对于这场始于次级贷款的金融危机,其表面原因即衍生品泛滥和杠杆化,但遗憾的是近年来美国金融界却有一个奇怪的共识,认为在衍生品和杠杆化问题上美国人走过了头,我们还不够,我们应该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出发,认为我们的金融市场太原始、太简单,要“创新”就必须向美国学习,搞衍生品和杠杆化,别无他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理清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思路,确定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向。

### (一)金融的异化

美国之所以屡屡爆发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因为衍生品玩过了头,这不是一个量的问题、度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方向问题,是价值取向扭曲,违背了金融的本原。应该从最基本的经济、金融、货币制度层面去思考金融危机的根源。

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中介服务的代理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服务,是实体经济的仆人。可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所言,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华尔街金融业已从“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这是过去40年来金融业最大的变化,也是最不幸的金融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

这种“不幸”在于金融已经背离了早期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产业资本的结合与服务模式,从服务代理人摇身一变成自我服务的委托人,仆人异化为主人,而且仆人的规模还远大于主人,本末倒置。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108%,时至今日,包括所有衍生工具合约的名义价值,金融业规模大约相当于实体经济的16倍。金融业的这种畸形膨胀,严重挤占、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业坐大,无疑归功于金融衍生品的“繁荣”和杠杆的滥用。那么衍生品是什么?何应运而出,他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

在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转移战场,加盟华尔街,借助计算机技术大搞金融创新,制造出了无数光怪陆离、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创造出了与实体经济需要风马牛不相及的金融市场巨额交易规模。

理论上衍生品是用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但市场实践倒给了我们相反的答案。一是鲜见使用衍生品挽救了谁,倒是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校要么被衍生品送进要么被重创的噩耗传来。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衍生工具不断涌现,不断复杂化以来,尽管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里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烈度越来越高。这些危机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正如《金融的魔鬼》一书的作者——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

事实上,金融市场人士最爱价格波动,衍生工具不是用来避险,而是

●我们应该破除对当代西方金融的迷信,客观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创新是金融的异化。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创新只在经济发展初期是有用的。同时,也不应该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金融危机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

●美国对中国的最佳遏制策略不是军事,而是让中国经济停滞、混乱,其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金融危机。如果我国内地金融市场上结构复杂的衍生品交易渐成气候,如果我们的资本管制长城自毁,撼天动地、威胁国家安全的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应千万慎重处理金融开放。我们金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们金融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基本政策应该是限制衍生品,放慢资本账户开放进程。

制造波动投机套利,没有波动就没有金融的高额利润。金融的另一高额利润条件是垄断。衍生品是他们的对赌工具而不是对冲风险的工具。因此,我们不应该破除对当代西方金融的迷信,客观清醒地认识金融创新。同时,也不应该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金融危机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金融创新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几无积极意义。随着金融系统不再是单纯的银行,电子交易与衍生品泛滥,金融业互为交易对手自我服务,经济增长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相关性就几乎消失了。例如,全球外汇市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但这其中98%的交易量和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即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非实际(投机)交易来帮助发现价格。其他金融期货等衍生品市场也基本属于类似情形。正是这些大起大落的短线炒作和掠夺对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保罗·沃尔克曾说:“谁能给我一丝客观证据,证明金融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只要一丝也行。”他还调侃说银行业能称得上有价值的创新就是ATM机了。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隆说金融是一只魔鬼长在实体经济身上的吸血乌贼,他与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 Bruce Bartlett、英国前金融监管高官 Adair Turner 等都有类似的结论:实证研究说明金融体系的深化只在经济发展初期是有用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清楚表明发达国家过去二三十年金融体系的规模化和复杂化为我们带来了经济增长或稳定。

放任经济的金融化会吞噬、挤占实体经济急需的资金资源,妨害中小企业成长。近几年我国货币发行量增长巨大,但中小企业依然缺钱,原因就在金融系统截流空转。另一方面,金融的过度发展会毒害投资文化,扭曲投资行为,破坏市场优化配置资源功能。不合理的高回报“黑洞”会吸引大量知识精英,资金资源急功近利,脱离实体经济,阉割民族产业的创业冲动,妨害实体经济的研发投入、创新升级、品质与品牌提高和持续发展。

Bruce Bartlett就曾指出:实证研究证据表明金融深化和实业投资是成反比的。事实上,金融的异化和实体经济已经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以金融定位,确定方向,框定边界,发挥正能量。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守这样一个理念:金融市场的功能是用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不是自我服务提升金融业的利润率。

### (二)金融的政策取向

毋庸置疑,现代金融在美国华尔街的误导下已经异化,走上了一条方向错误的道路,这个方向错误不仅是指它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而且是指它正走向峭壁悬崖。但对美国来讲,却因其自由主义哲学,华尔街利益集团疯狂逐利的本性以及来自白宫、国会甚至学界的巨大影响,金融无力自我纠正,这已经成为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危机来临时,华尔街大佬们恳请监管者约束他们冒险,帮他们关掉音响的开关。时任美国花旗集团的CEO 查克·普林斯哀叹道:“只要音乐还没停,你就要继续跳舞。”这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和利益的驱使。

金融海啸刚刚过去四年多,针对这场危机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才刚刚施行了两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就扬言,如果当选总统就废除该法案。曾闯下大祸一手制造了这场危机的华尔街老板们也不思悔改,蠢蠢欲动,企图阉割、削弱这部法案。他们为什么如此健忘?因为该法案的“沃尔夫规则”限制他们在掉期市场、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方面的投资,禁止银行参与有关自营交易,这将使美国最大的八家银行每年损失220-340亿美元。

不管美国人的情愿还是不愿意,不管美国的有识之士如何大声疾呼,美国是要一条道走到黑的。望着美国的

背影,我们该怎么办?有一部拍得很美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影片奖,专门描写2008年金融危机前因后果的电影《监守自盗 Inside Job》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形象真实的启示。通过片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专家学者的调查见证和探讨,通过镜头看到的众多金融家、评级机构、监管高官和利益攸关的学者们在危机前后的言行表现,可以使我们对金融、衍生品和危机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认识,如醍醐灌顶。

我国金融发展正处在一个战略选择的三岔口,虽然有自由主义的呼声。美国自由贸易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也认为贸易自由化的论点并不适用于金融自由化),但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还未成气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还很强。因此应该发挥制度优势,确定政策方向,走出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金融发展道路。

一是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观上,要坚持一切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价值取向,以满足实体经济需求为底线,不应以美国市场为模板,追求所谓的金融产品的系统性、市场结构的复杂性。坚持简单哲学(人类的智慧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坚持现货市场,限制杠杆交易。

二是在金融风险的控制上,我们要确立制度规范为主、监管防范为辅的基本思路。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他的《峭壁边缘》一书中说道,为了“更有效地应对不可避免的市场动荡的世界”,应该改革监管体系,给监管者更广泛的授权。我认为加强监管,给监管者广泛而充分的授权是必要的,但治标不治本。如果没有正确的制度规范,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一定如他所言“不可避免”。因此,我们设计市场制度应该只允许金融做它分内的事情,把市场纳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把魔鬼关进笼子。如其不然,市场一旦误入错误的方向,恶制度也会使好人丧尽天良,不要指望节制、制度的把握,也不要指望监管,贪婪会冲垮所有的堤坝。

三是注重金融政策研究,辩证分析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保持清醒的政策方向感。既要肯定政策的积极意义,也要警惕其反向杀伤力,权衡利弊,适时调整。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资产证券化的最重要作用就是盘活存量,释放流动性,同时有助提高资本收益率,甚至改善信贷期限结构错配的风险。但资产证券化是一把“双刃剑”,作为表外业务的资产证券化最致命缺陷,是弱化了发起人对贷款质量的约束,并增强业务扩张的冲动。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常态业务品种,势必以各种形态层出不穷,日益复杂,良莠不齐的风险资产都会被打包进来。另外,资产证券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也会冲击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控制风险特别是经济下行之后的风险,问题绝不会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大家都知道,那么次贷危机正是源于资产证券化,那么我们就管控自如,幸免于难?因此,资产证券化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和临时工具用来化解当前的结构性资金困难,浅尝辄止,不能常态化、扩大化。存量结构调整的根本还是要坚决限制资金在金融系统的空转循环,限制理财产品、信托产品涉足衍生品交易,限制杠杆化和结构复杂的产品,把资金引回实体经济。

对已经推出的金融期货和即将推出的金融期货以及准备推出的期权等衍生品,我们也应慎之又慎,重新评估检讨。正如本文前面所述,这些产品的避险功能有限,但致险数量无限。即使衍生工具可以在微观上对冲风险,降低市场波动,对利率市场形成等有帮助,但考虑到衍生品交易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坚决限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即使这种限制会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的排名地位,影响金融就业,我们也在所不惜、坚定不移。

在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问题上,还是希望我们能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应明白这是没有超人的免疫力的,只要踏上这条路,我们一定会重复与美国人相同的错误,只不过会输的更惨,也许会万劫不复!

华尔街的瘾君子们是不可能自

我戒毒的,西方的制度也无能为力,倒是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不盲目跟风,不为潮流所动,理清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坚定不移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 资本账户开放与本土经营权让渡

人民币国际化关系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和安全,是我们的战略方向,问题是应该如何如何在愿望与现实、利益与安全之间权衡,采取什么方式,以什么样的节奏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我理解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主张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甘接受美元霸主地位对我们经济利益的侵害,这无可厚非,可必须冷静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局面是基于我国人均财富水平和所处发展阶段决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美元的霸道是对我们的剥削,但是如果不韬光养晦、蓄势图强、谋定而后动的话,美元带给我们的就将是灾难。

首先,应该了解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霸主地位的基础。就和二战之前英镑全球称霸的原因是英国经济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样,今天美元的地位是美国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不是美元的地位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地位。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力地位而不是相反。虽然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计算还很落后,人民币出海还为时尚早,还经不起风浪。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奉行安全第一原则。实行资本账户管制的主要考虑与其他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和曾经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考虑的主要原因是相同的——安全。那么,今天试图开放资本账户的理由就理所当然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警报已经解除,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尽管我们有资本账户屏障,但这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渐复苏,其“退出”时间、方式与影响无法预测,我们面临的宏观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二是国际资本市场衍生品交易泛滥,市场的广泛联系与复杂性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管制,我们的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是没有保障的,而国家安全是不允许用来尝试与冒险的。曾经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上应对过两场金融危机,特别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金融大鳄有过实战搏杀经验的任志刚先生就深有体会地指出,金融脆弱性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市场的开放程度,香港的市场正因为高度开放和自由,而且写入了《基本法》,维护稳定性成为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他对国内开放资本账户对金融安全的威胁也不无担心。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的机遇判断。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事关未来几十年持续发展前景的大事,所有的经济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线,一是支持保障,二是不能干扰添乱。虽然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调整就像转弯,而转弯就要减速,不仅是发展速度要减,一些存在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改革事项也要减慢。现在还不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风险的资本账户开放改革的机遇期。如果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我国经济出现波动且失去资本账户管制的保护,国际热钱和对冲基金等必然伺机寻找投机套利的机会,或热钱冲击,或资本外逃,不排除其利用股市、期市和汇市多方发起攻击“做空中国”。当前和未来几年我们尤其要警惕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没有资本账户壁垒,跨境资本攻击时或经济危机发生时我们将如何通过汇率和利率工具抵御攻击,我们将丧失调控经济的自主权和主导权。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步骤。虽然目前尚不具备实现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的条件,但可以确定方向,在安全稳健的前提下探讨实施步骤,按照“可控、渐进、主动”的原则逐步推进。

我赞同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两个“三步走”的战

略建议。即未来30年在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上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分三步走完“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未来30年在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上也可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分三步走完“贸易结算化”、“金融投资化”、“国际储备化”。如此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30年后我国按人均收入水平和综合国力将跻身世界前列,人民币国际化将水到渠成。

第五,本土资本市场经营权让渡许可策略。资本账户开放包括资本本土币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外资在本土本币资本市场经营权的开放。我建议,一是严格限制外资投资本土币资本市场,因其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二是外资在本土本币资本市场经营权的开放要坚持安全与公平对等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我国设立的金融机构无论数量、权益比重还是业务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得寸进尺,不断向我国施压争取更大的利益。反观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壁垒森严,至今我们的这些机构在西方国家还寥若晨星。时至今日,我国的证券、基金公司在发达国家只有一家分支机构,还是非美国本土证券业务的基本牌照。我某金融机构收购外国一家金融企业历时经年,欧美数国的批准程序还未完成。西方国家对我国企业以安全为由的严格审查、限制与歧视,表明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我们更不必盲目追求,轻言资本账户开放。

因此,无论从国家安全角度还是公平对等原则来考虑,今后我们在各种对外谈判中,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都一定要坚决顶住压力,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美元、股权比重和业务范围,决不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平衡、不对等的扭曲格局继续恶化。

## 警惕国家安全的金融防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经济逐步纳入全球经济轨道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我国却独善其身,幸免于难,既未自爆危机,又未被全球危机引爆。究其何故?不是我们的金融市场比别人的管理水平更高?当然不是,答案很简单:一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基本是一个现货市场,结构简单,杠杠不高。二是我们有一堵资本管制的“万里长城”,帮我们挡住了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纵横驰骋、攻城掠金的强盗。

但时至今日,情况却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我国的金融市场开始变得不再简单,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泛滥,被巴菲特看作“核武器”的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不断推出,期权交易也在酝酿之中,资产证券化、交易所公司化等高风险产品和有悖于市场公平原则的组织形式也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步伐的政策呼之欲出,已成主流意见。也就是说,眼见得使我国这些年超然于金融危机之外的两大因素渐行渐远,金融危机离我们却越来越远。

我印象非常深刻地记得一位美国智库专家所讲的遏制中国策略。虽然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并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布局已日趋完成,但他认为军事遏制困难且成本太高,搞得不好还会两败俱伤,最有效的遏制方式就是设法阻遏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中国经济停滞、混乱。那么如何破坏中国经济发展,打贸易战?我看不灵。对中国经济杀伤力最大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金融危机!

如果我国内地金融市场上结构复杂的衍生品交易渐成气候,如果我们的资本管制长城自毁,我看不出美国政府组织金融攻击,市场的力量也足以掀起惊天巨浪。一是衍生品交易会让我们自乱。二是境外的金融大鳄和各路热钱会长驱直入,操起我们准备就绪的他们熟悉擅长的各种“战术核武”——衍生工具展开全面攻击。如果这样,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撼天动地的金融危机就会这样爆发。我的描述尚未涉及债务风险与资产泡沫,这些因素与衍生品交互作用会更加可怕。( )

如果我国发生金融危机,将会是一场威胁国家安全的全面灾难。经济全面萧条,大面积失业,人民群众金融资产缩水本无归等情形可能会引发社会风潮。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过渡期与敏感期,一旦稳定大局失控,中国的发展道路将会逆转,那将是一场中华民族的灾难、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

鉴于此,应千万慎重处理金融开放!我们金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我们金融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基本政策应该是限制衍生品,放慢资本账户开放进程。

(作者为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局长)

## 强化公司治理 应建立高效审计委员会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芮怀涟 王诗仪

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的公司治理起着关键作用。审计委员会肩负着为企业股东进行监督财务报告流程和外部审计的职责。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越来越重视审计委员会的角色及问责性,尤其是履行财务报表审计方面的职责。公司治理制度健全的企业一般都具有高效的审计委员会。

中国的监管机构也意识到中国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制度的重要性。2002年,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列明了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角色和职责。其后在2008年6月,中国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基本规范》指明审计委员会应具备的监管及评估内部控制有效运作的职责。目前在中国内地推动公司治理完善的机构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该协会是全国性自律组织,在证监会的支持下于2012年年初成立。

在国际层面,中国自1995年起已开始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紧密合作,并于2007年加强了双方的合作。经合组织发布的《公司治理原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良好公司治理的典范。自2010年起,证监会开始参与经合组织的公司治理委员会会议。2011年,证监会和经合组织联合出版了一份题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自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构框架。

世界其他地区对审计委员会及其在促进企业公司治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少重要举措。其中包括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2002年)第301条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规则,欧盟的第8号指令,澳大利亚的第9号公司法经济改革计划,以及英国财务报告局和新加坡会计及企业管理局的审计委员会指引。

从有效的审计委员会所具备的特点来看,一方面,审计委员会成员组成应多元化。由拥有具备财务和非财务技能的成员组合的审计委员会,有利于促进委员会工作的客观性和怀疑精神的发扬。审计委员会有一至两名具有财务和会计背景的人员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公用事业)较为复杂,则具有特定相关行业经验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然而,要求审计委员会成员拥有特定经验可能会有损经验多元化带给审计委员会的好处,因为这样可能忽视了不同行业 and 不同企业的不同需要。

另一方面,审计委员会主席应具有领导才能。审计委员会主席应为委员会其他成员强而有力的领袖。强有力的审计委员会主席有利于与董事会、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和开展坦诚的沟通。领导才能出众的审计委员会主席还可促进委员会内部的良性沟通,并鼓励成员与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提出尖锐的问题。这对审计委员会监督财务报告流程和外部审计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审计委员会主席宜拥有审计或会计的相关知识。

风险管理是审计委员会重要职责。财务报告和审计的监督是追溯性的,而风险管理在本质上却是前瞻性的。因此,审计委员会的风险监督必须持续不断才能发挥效用,而审计委员会的工作日程则可以按照风险水平排列先后次序。

定期与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会面有助审计委员会了解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审计委员会还应考虑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等外部人士的相关意见,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内部或外部审计师不一定能发现的风险或其他问题。

审计委员会必须直接负责监督外部审计师的工作并决定其酬金,以及就外部审计师的委任、连续聘用和影响聘用事宜提供建议。管理层对审计委员会的影响力应受限制。因此,强制企业轮换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或将审计合同重新招标的安排,将可能有损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影响其根据企业特有的业务模型和挑战,为企业选择最有资质进行审计的外部审计师的能力。

审计委员会应与董事会、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审计委员会根据董事会的意见及方向指引,对财务报告流程和外部审计师所涉及的关键事项进行监督。为了让董事会更加深入了解审计委员会曾探讨的事项,审计委员会可向董事会提交有关的书面报告或审计委员会会议记录以供参阅。此外,审计委员会也可安排外部审计师出席董事会会议,以便就财务报告或审计相关事宜提供讲解或资料。

审计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管理层和利用管理层提供的信息。因此,审计委员会需要对其监管财务报告流程以及向管理层提出关键性问题的权威具备信心。审计委员会也可与不同的业务单位主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以深入了解相关业务的具体运作和风险。此外,与内部审计师维持良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可让审计委员会在监督财务报告流程和外部审计师的工作上更加得心应手。

审计委员会在履行职务上必须保持透明度,也必须遵守现有的报告要求。审计委员会应根据公司的个别情况对是否需要额外报告进行灵活处理不必墨守成规,以避免出现“信息披露过剩”的问题。

长期以来,审计行业一直面对着“期望差距”的问题,现在审计委员会业界人士也面对同样的挑战。因此,一项紧迫任务是通过教育促进群众了解审计委员会,缩小审计委员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在审计委员会的角色上所出现的期望差距。

(芮怀涟是毕马威华振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部中国公共政策和法规(监管)事务主管合伙人,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副总会计师。王诗仪是毕马威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部中国公共政策和法规(监管)事务主管,曾担任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高级技术经理。)